

引文格式: 赵宇霞. 空间批评视域下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加拿大民族身份想象 [J]. 常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3(4): 100-107.

## 空间批评视域下艾丽丝·门罗小说中的 加拿大民族身份想象

赵宇霞

**摘 要:** 加拿大的被殖民历史注定其民族身份形成的漫长过程, 从殖民拓荒时期开始, 到英属加拿大时期, 再到加拿大民族国家的成立, 加拿大民族身份不断被想象与定义。作为民族想象的载体, 文学一直是作家对其所属民族身份进行想象与构建的工具。在艾丽丝·门罗的文学世界中, 民族身份往往与加拿大人的日常生活空间相伴。通过书写荒野、洞穴及“门罗小镇”, 她对加拿大 18 世纪殖民拓荒时期、20 世纪 60 年代民族主义盛行时期以及民族主义消退之后的民族身份进行构建, 最终构建出从疯癫到自恋再到“居于间者”的加拿大民族身份。一方面, 这种通过书写庸常的日常生活空间对民族身份这一宏大主题进行表征的叙事方式诠释了门罗的后现代叙事风格; 另一方面, “居于间者”的民族身份也为“全球一体化”背景下不同民族如何既保持本民族独特身份又与他民族共存提供一定的启示。

**关键词:** 艾丽丝·门罗; 民族身份; 空间书写; 阈限空间

**作者简介:** 赵宇霞, 长治学院外语系副教授。

**基金项目:** 山西省高等院校外语教学与研究专项基金一般项目“民族与个体身份——空间批评视域下艾丽丝·门罗小说研究”(SSKLYY2020051)。

**中图分类号:** I106.4; I711.074 **文献标志码:** A **Doi:** 10.3969/j.issn.2095-042X.2022.04.011

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构建过程始终与其被殖民历史相伴。1608 年, 法国人塞缪尔·德·尚普兰首先在魁北克建立殖民地, 这一殖民地的建立成为法国在加拿大展开殖民活动的标志, 同时也是“新法兰西”时期的开始。与此同时, 英国也开启了其在北美殖民地的开拓。在接下来的 200 多年里, 殖民地人分别经历了“新法兰西”时期和英属加拿大时期。1756 年, 英、法之间爆发“七年战争”, 随着 1763 年双方签署《巴黎条约》, 加拿大最终确立为英属加拿大。英属加拿大时期, 美国曾对其进行过两次入侵, 这两次入侵非但没有将加拿大并入其版图, 反而使英裔、法裔居民联起手来, 共同为加拿大而战, 激发了加拿大民族主义意识。1867 年, 随着《英属北美法案》的通过, 加拿大自治领成立, 这标志着加拿大民族国家的形成<sup>[1]</sup>。尽管这一时期的加拿大在很大程度上只是政治产物, 而不是以民族情感作为其立国保证, 但是随着“加拿大第一”运动的展开, 自治领的英、法后裔被凝聚起来, 共同塑造了一个全新的加拿大民族。1967 年, 加拿大联邦成立 100 周年, 加拿大人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高涨, 人们努力寻求既有别于英、法殖民母国, 又有别于近邻美国的加拿大民族身份。

在加拿大思想界, 为加拿大民族身份缺失深感担忧的弗莱认为, 加拿大人的身份问题实质上

是“文化与想象上的问题”<sup>[2]</sup>。弗莱的观点一定程度上呼应了本尼迪克特·安德森的民族想象论。安德森认为民族是“想象的共同体”，民族的存在并不是因为这些人居住在共同的政治和经济体当中，而是因为他们承认并共享相似的历史文化与记忆。民族这个“想象共同体”最初是通过“语言文字”来想象的<sup>[3]</sup>。无独有偶，科尔斯也认为文学可以被视为民族想象的工具<sup>[4]</sup>。因此，加拿大作家纷纷通过其文学作品来对加拿大民族身份进行想象构建也就在情理之中了，作家艾丽丝·门罗便是其中之一。

20 世纪 70 年代，法国哲学家列斐伏尔《空间的生产》的问世及福柯《权力的地理学》的出版，开启了思想界的空间转向。空间不再仅仅被视作人类活动的场所，而被理解为人生产实践的产物<sup>[5]</sup>以及权力运作的介质<sup>[6]</sup>。换言之，空间问题的思考从传统地理学层面提升到了哲学社会学高度，对空间认知的转向强有力地影响到了哲学、社会学、地理学、城市学、文化学等领域。正如后现代地理学者苏贾所说，“在 21 世纪来临之际，有了一种我们对生活的社会、历史和空间性维度的同时性及交互缠绕，即它们的不可分与玄妙的相互依赖性的新意识”<sup>[7]</sup>。随着空间转向对当代文艺理论和文化研究影响的增强，空间或空间性研究越来越多地进入文学及文化研究的视野，成为人们关注的热点。小说中的空间不再只是故事发生的固化场所，转而成为时间、历史的表征，成为作家或人物的生存体验表征<sup>[8]</sup>。传统叙事中，民族身份往往与那些具有标志性的风景或建筑物相联系。然而，正如伊登索尔所言，“日常生活中的普通空间都可以被看作是地域和民族共时性的积累和表现，是人们对他们所熟悉和居住其间的地方的共同知识和集体演绎”<sup>[9]</sup>。在门罗的作品中，作家正是将加拿大人的日常生活及其所处的地理空间与民族身份相联系，通过对荒野、洞穴及介于城市与乡村间的小镇等与加拿大人日常生活紧密联系的地理空间的书写，对殖民拓荒时期、民族主义盛行及消退时期的加拿大民族身份进行诠释，最终完成了加拿大民族身份的构建。

## 一、荒野——新旧世界碰撞下的疯癫者

与其他欧洲殖民地的历史一样，早期法国、英国对加拿大的殖民史也可以追溯到 16 世纪末 17 世纪初的文艺复兴时期。通过这场运动，人们复兴了古希腊苏格拉底式的命题——认识自我<sup>[10]</sup>。一定意义上，这些早期的欧洲殖民者离开自己的母国，来到美洲新大陆开疆辟土，一方面，希望以此来稳定自己在母国的中心地位；另一方面，也希望在这片新大陆确立自己明确的身份。门罗的小说《荒野小站》正是以这一时期的殖民拓荒为背景，讲述了赫伦兄弟在加拿大的休伦县及布鲁斯县一带开疆辟土的故事。殖民拓荒时期的加拿大地理环境恶劣，人烟稀少，但是严酷的地理环境未能阻挡早期英、法移民建立独立家园的梦想。如乔治在其回忆录中所言，“我们一旦够年龄就离开此地，去拥有自己的土地独立生活”<sup>[11]201</sup>。14 岁时，西蒙与乔治出发前往广袤的休伦，他们“砍掉灌木，辟出了一条小路，接着标好了边界，砍了盖棚屋用的原木，准备好了装屋顶用的大木铲子”<sup>[11]202</sup>。盖好房子之后，在牧师麦克贝恩的担保下，哥哥西蒙请求多伦多劳动收容所的负责人为其介绍一位身体健康且不怕吃苦的女子做他的妻子。最终，安妮来到两兄弟身边并做了西蒙的妻子。以赫伦兄弟为代表的早期拓荒者在加拿大荒芜地区通过了解土地来确立自己在荒野中地位的行为暗示着荒野不仅是早期移民明确自己的身份之地，同时也是孕育加拿大民族身份之地。对于这些早期移民而言，自我身份追寻之路任重而道远，他们不仅要克服面对恶劣自然环境的恐惧，同时还要面对来自故乡旧秩序的约束。换言之，早期移民的民族身份是其身

处的自然空间及社会空间共同作用的结果。

小说《荒野小站》中,安妮初到西蒙与乔治拓荒之地虽已累得筋疲力尽,但还是对眼前如此多的丛林地大吃一惊。麦克贝恩牧师在写给监狱治安员马伦的信中更是详细地对这一地区的地理环境进行了描述:“凛冽的风穿透木墙,外面只有茂密的丛林和冻结的沼泽,能将人和马都吞没。”<sup>[11]211</sup>这里,无论是从安妮的视角,还是从麦克贝恩的视角,都生动再现了拓荒区恶劣的自然环境。对于西蒙、乔治、麦克贝恩牧师等拓荒者而言,他们只能忍受着种种煎熬,最终被冷漠的荒野击败,并走向疯癫:哥哥西蒙一意孤行,妄想凭借两兄弟的力量征服荒野;弟弟乔治对哥哥的偏执虽不满却又不愿与其沟通,最终用斧子将其砍死;麦克贝恩牧师满腔抱负地来到这片荒芜之地传播信仰,希望引领人们走出心灵的荒芜,终以失败告终。他们的失落恰如牧师写给治安员马伦的信中所言,“这世界就像一片荒野,我们的确能够改变自己在其中的位置,但也不过是从一个荒野小站到另外一个罢了”<sup>[11]212</sup>。对于这一时期的移民而言,“荒野”不仅指令西蒙兄弟及麦克贝恩牧师走向疯癫的荒芜的自然空间,还指令安妮精神失常的无序的社会空间。

所谓“社会空间”,即各种社会性元素的关系建构,主要强调特定物理空间中政治、经济、权力、种族、阶层、文化等因素。早期的加拿大移民中,苏格兰人是最庞大的一支队伍。对于这些苏格兰移民而言,离开故土来到这片荒野之地并不是简单将其文化从一个表层转移到另一个表层,而是要在欧洲旧世界与殖民地新世界间架起一座桥梁,最终完成对新世界的塑造<sup>[12]</sup>。因此,在对新世界塑造的过程中,旧世界的符号体系被不同程度地加以改变,形成了加拿大殖民早期的社会空间:以赫伦兄弟为代表的早期拓荒者,他们努力在荒芜地区建立家园,渴望在荒芜的新世界里构建起秩序与权威;以麦克贝恩牧师为代表的神职人员,他们跟随上帝的指引,冒险来到这个最需要牧师的地方传教,希望能在社会及宗教层面根除这里荒蛮无序的状态。概言之,无论是拓荒者还是神职人员,他们共同致力于在无序中建立有序,并最终建立自己的权威。而在这一社会空间中,女性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故事开头,西蒙写信请收容所的负责人为其推荐一位姑娘做妻子,对方的回复勾勒出当时社会对女性的规约:“来自基督教家庭,因为父母双亡才被安置在收容所,不涉及酗酒或任何不道德因素。而那位比较适合西蒙的姑娘虽肤色稍暗,却并非因为混血。”<sup>[11]200</sup>寥寥数笔便刻画出加拿大殖民拓荒时期社会对女性的约束和规范:她们不仅要有纯正的宗教信仰,还应在日常生活中服从父权制的权威。成为西蒙的妻子之后,面对妄自尊大、为一点小事就将其揍倒在地的丈夫,安妮只能忍气吞声,直到乔治将西蒙砍死。荒野恶劣的生存条件及赫伦兄弟的冷漠,最终令安妮出现了疯癫的举止。“她不再参加教会活动,农场逐渐衰败,给了她豌豆和马铃薯去种在树桩间,她也不种;门口长满了野藤蔓,她也不清理;她连火也不生,吃不上燕麦蛋糕和粥;甚至家里的大门整日敞开,动物们早已在那里进进出出。”<sup>[11]207</sup>至此,无论是在精神上还是日常生活中,安妮都进入了一种无序的状态,而这种无序正是以赫伦兄弟及麦克贝恩牧师为代表的早期移民想努力根除的。由此可见,对于殖民地区的拓荒者而言,要想在新旧两种体系的碰撞中构建出个体身份、形成集体意识直至最终形成民族身份还任重而道远。

## 二、洞穴——沉醉于过去的自恋者

加拿大的被殖民历史注定了其民族身份形成的漫长过程。殖民地时期,加拿大同时向英、法两国宣誓效忠。1867年,加拿大虽成为独立联邦国家,但是其殖民地地位仍在继续,甚至到了20世纪,许多加拿大人仍不忘对英、法母国文化的单相思。20世纪初,美国经济与技术缓慢入

侵加拿大，最终结果便是：当加拿大人还在质疑能否摆脱其英、法殖民地思维的时候，无意识之中却已成了美国的经济殖民地。这一切无疑构成了加拿大民族身份想象的障碍。20世纪60年代，随着加拿大在政治上的独立，加拿大人开始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因此在意识上表现为一种逐渐增强的“过去取向”。这种取向使得加拿大人开始对英、法文化遗产和传统进行探索。“过去取向”本是一种文化成熟的标志，因为过去为人们提供了一种可能的秩序，回顾过去既能对现在做出阐释，也能为将来做出准备。然而，“过去取向”也有其消极的一面。“对过去的缠绵终会转为一种自恋式的自我陶醉，沉醉于自己的世界也只会忘记了其他一切，最终失去了对未来的信心。”<sup>[13]</sup>对于这一现状，门罗通过其短篇小说《温洛岭》做出回应，并表达了个人对于“过去取向”的解读：回顾过去但不应沉湎于过去，回顾过去是要获得对现在的理解。其作品中的叙事者也会回到过去，但最终他们还是重返现实并继续他们与社会的关系。

小说《温洛岭》中，叙事者以第一人称回顾性叙事视角讲述了其在安大略省的伦敦读大学时的一段经历。与门罗成长小说中的其他女性人物相似，小说中的女主人公“我”出生在乡下，由于家境贫寒，不得不靠在学校餐厅工作来维持自己的大学生活，舍友妮娜优越的物质条件激起了“我”对妮娜的包养者普维斯先生的好奇。因此，当普维斯先生邀请“我”周末与其共进晚餐时，“我”欣然前往。普维斯先生的房子位于“一条被高大的树篱包围的狭窄车道边……这是现代派的建筑，因为屋顶是平的，窗户开在一道长长的墙上”<sup>[14] 86</sup>。此时虽是圣诞来临之际，但是房子“没有圣诞灯。其实，根本就没有灯”<sup>[14] 86</sup>。作为承载居住者内心的家宅，普维斯先生的居所呼应了其与外界隔绝的心灵。无论是“开在一道长长的墙上”的窗户，还是“没有圣诞灯。其实，根本就没有灯”的外表，这座房屋都向读者传递出一个与外界隔绝的居住者形象。“车子滑进巨大的地下室，我们坐电梯到了一楼，进了一间光线昏暗的厅堂，装修得像是客厅，搁了坐垫的硬木椅子，抛光的桌子，镜子，还有地毯。穿过一扇扇门，温纳太太在一扇门前示意我走到前面……”<sup>[14] 86</sup>房间内部光线昏暗的厅堂、地下室等内部空间与整座房子的外表呼应，进一步肯定了房主人的隔绝者形象。随着叙事的进一步推进，尤其是叙事者讲述到普维斯先生要求与其进餐的女性必须裸体时，该人物除了隔绝者的形象外，还是一位傲慢、以自我为中心、强调男性权威的形象。因为在他的眼里，无论被其包养的妮娜，还是应邀与其共进晚餐的“我”，这些女性都是供其凝视、控制的“他者”。可以说，普维斯先生的与世隔绝并非不得已，实为自我依恋的结果。对于这一原因，读者在其与叙事者的交谈中可以获知。当普维斯先生与“我”谈论古希腊哲学并提及柏拉图的洞穴比喻时，普维斯先生表示：“洞穴理论，很美，不是吗？”<sup>[14] 90</sup>依据柏拉图的洞喻说，洞中被束缚的人对于世界的认识仅停留在感官层面，而那些有幸挣脱束缚，走出洞穴的人才会将对世界的认识由感性提升至理性层面。此外，柏拉图的洞喻说不仅涉及从感性到理性的认知上升之旅，同时还包含返回之路，即那些走出洞穴瞥见真理之光的哲人重新返回洞穴去启蒙大众的过程<sup>[15]</sup>。小说《温洛岭》中，普维斯显然认为自己隐身洞穴的缘由属于后者。依据叙事者的叙述，普维斯不仅曾经游历希腊，还拥有一间藏书室。对于这种家庭藏书室，叙事者“我”表示：“只在书上见到过。”<sup>[14] 91</sup>随着普维斯先生要求“我”为其朗读《西普罗郡少年》，其隐身洞穴的真正原因趋于明朗。《西普罗郡少年》是英国诗人豪斯曼的第一部、也是最著名的诗歌集。整本诗集弥漫着一种感伤情绪，只言片语间，悲伤便通过文字直抵人心：好友或英年早逝或身陷囹圄，情人不忠，年少时的欢乐转瞬即逝……。豪斯曼诗中的少年也谈情说爱、喝酒打架、寻欢作乐，但是心理上却从未放松享受过这一切，因为他们始终被笼罩在“失去”的阴影之下：失去爱情、友情、青春乃至生命<sup>[16]</sup>。显然，门罗将这首诗嵌在其小说中的目的不仅仅是营

造一种伤感的氛围,还借此来映射普维斯先生隐身洞穴的原因。当叙事者“我”被诗中忧伤的氛围感染,尤其是在读到“温洛岭一带草木深诉着悲苦……狂风不断地吹击偃蹇的幼树,它吹得这样猛,将没有多久延捱:今日那个罗马人和他的忧苦已与古乌里恭城俱委荒埃”时<sup>[14]93</sup>,“我”最终明白了普维斯先生隐身洞穴并非要启蒙大众,更多地源自个人对于已逝过往的怀念。同时“我”也突然意识到:“世界上的每一个人,在某种程度上,都是赤身裸体的。普维斯先生穿了衣服,但他是赤裸的。我们全都是忧伤的、赤裸裸的、矛盾重重的生物。”<sup>[14]93</sup>这里,门罗借叙事者的声音表达了自己对于“过去取向”的理解:一味地沉湎于过去,只会因陷入对已逝过往的伤痛而忘记了未来,回顾过去是要获得对现在的理解。因此叙事者“我”只有在离开普维斯先生与妮娜之后才会意识到:“学校图书馆的建筑高大漂亮,有一些人相信,坐在书桌前,面前放着一本敞开的书的人,头顶都应该拥有一片足够的空间……现在,轮到我了,我应该拥有图书馆。”<sup>[14]102</sup>显然,叙事者拥有图书馆的那一刻,正是其走出“洞穴”寻求未来的时刻。

### 三、门罗小镇——集矛盾性与混杂性为一体的“居于间者”

从1867年加拿大联邦成立到20世纪90年代初,民族主义倡导对加拿大民族身份想象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是因其在构建民族身份过程中强调占人口多数的英、法文化,忽略英、法文化之外的其他少数民族文化而遭到了一定的抵制。1988年,加拿大议会正式通过《加拿大多元文化法案》,加拿大文化被定义为“马赛克”文化,强调加拿大各民族文化的多元共存。与此同时,近邻美国对于加拿大的文化殖民也使得美国文化成为加拿大“马赛克”文化成分之一。正是这种以英、法文化为主、多元文化共存,加之近邻美国文化的影响,使得加拿大民族性呈现出非此亦非彼的“居于间性”<sup>[17]</sup>。门罗小说的创作背景多为以其故乡西南安大略省的休伦地区为原型的小镇,它们既不属于中心城镇,也不是乡下的一部分,从社会经济、文化意义上来看,这些小镇多介于“中心”与“非中心”之间。门罗选择小镇作为其故事的背景,有其个人成长原因,亦因小镇无论在物理空间还是社会空间中占据的位置都与加拿大民族的“居于间性”高度契合。

地理学者段义孚在其《恋地情结》一书中谈及城市、乡村、荒野三者的关系时指出,“乡村是一种中间景观,是平衡城市与荒野两个极端的理想中间景观”<sup>[18]</sup>。从这一角度来看,无论对于城市还是荒野,小镇均是一种边缘性的存在。以艾丽丝·门罗的短篇小说《沃克兄弟的放牛娃》为例,叙事者“我”与家人居住的图柏镇是位于休伦湖畔的一个老镇,与一家人之前居住的邓甘镇相比,这里“没有脚爪托起的浴缸,没有冲水的马桶,水龙头里没有水,人行道不路过家门口,甚至,没有电影院,没有维纳斯餐馆,没有伍尔沃斯连锁店”<sup>[19]7</sup>。这里,空间布局上的对比凸显了图柏镇的贫困与偏远。但是,与那些“谷仓、棚屋、房子、厕所都是灰色的,院子和田野都是褐色的,狗则不是褐色的就是黑色的”<sup>[19]12</sup>居住地比起来,图柏镇又不算太偏远,至少这里还有坑坑洼洼的马路以及被树根挤裂了的人行道。显然,图柏镇便是介于城市与乡村、中心与非中心之间的“门罗小镇”。

在门罗构建的“门罗小镇”中,“边缘性”不仅体现在其作为物理空间的存在,更主要体现在其所处的社会空间中。如前所述,加拿大特有的被殖民历史促成了其社会文化的多元性:这里有以英格兰为代表的商业传统,以苏格兰、爱尔兰、法国为代表的农业传统,遥远欧洲的精英主义传统,以及近在咫尺的美国大众消费文化。这种多元的文化背景使得无论哪一种文化背景对于其他文化而言都是一种“边缘化”的存在。以门罗另一部短篇小说《亮丽家园》为

例，作者将小说故事置于一个正在开发却尚未完全开发的小镇上。尽管小镇因为新近开发而改为“花园宫”，并且街道名称也重新以花命名，但是对于以城市为中心的商业文化而言，无论是“花园宫”里居住的没有多少钱的人，还是屋子后头、路的一边随时会被砍掉以便于社区修建的笨重的松树，都标示出“花园宫”里的边缘位置。而夹杂在新房子中间那些“外墙没有被粉刷修补过，被简陋的棚屋、成垛的木料、堆积的肥料以及灰色的木栅栏包围的”<sup>[19]30</sup>老房子，尤其是其所代表的传统重农文化，对于“花园宫”而言又是一种边缘化的存在。这种社会空间中互为彼此边缘的空间存在正是“门罗小镇”的真实写照，同时也是加拿大民族的存在状态，即霍米·巴巴后殖民理论中的“阈限空间”<sup>[20]</sup>。在其后殖民理论中，巴巴使用“阈限空间”来指涉殖民语境下被殖民者的社会存在状态。“阈限空间”是一种临界的、边缘化的他者空间概念，具有临界性和阈限性的特质。对于身处阈限空间中的阈限主体，“一方面由于临界和被边缘化造成其身份的边缘性、居间性和不确定性，脱离或被抽离出原有族群而成为本族群内的‘异类’；另一方面也逐步从身份的居间性演变为心理上的混杂性、异质性和矛盾性，在进入下一稳定社会状态时必然同样会被视为‘异类’”<sup>[21]</sup>。显然，后殖民时期的加拿大民族正是以阈限主体为其身份的主要存在形式：不管对于英、法宗主国文化，还是近邻美国文化，加拿大人无疑为一种“他者”形象；而对于本群体内的多元文化而言，不同文化主体又互为“他者”。这种双重的“他者”形象正是门罗首部短篇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中所谓的“快乐影子”，他们的存在始终以占据社会空间中心位置的主体存在为前提。

依然以小说集《快乐影子之舞》中的两部短篇小说《沃克兄弟的放牛娃》及《亮丽家园》为例，在第一部作品中，主人公乔丹在养殖狐狸失败后不得不举家离开繁华的邓甘嫩镇而迁往图柏镇，而图柏镇的居间位置也映射了乔丹的双向“他者”身份。对于受英格兰重商文化影响的妻子而言，乔丹走街串巷的推销员身份显然令其羞于启齿。因为在传统的英国文化中，即使在商人中间，仍然存在很大的社会差异：商人的地位最高，接着是批发商，然后是小商人，最后是零售商。因此，乔丹与妻子间互为“他者”的窘境也正是夫妻心理上疏离的根源所在。小说中，除去妻子外，对于乔丹信仰的新教而言，曾经的恋人天主教徒诺拉亦是一种“他者”的存在。这种彼此间互为“他者”的现实使得小说中的人物彼此疏离，乔丹只能在阈限空间中努力追寻自己的梦想。

如果说《沃克兄弟的放牛娃》中，阈限空间导致了人物心理上互为疏离的话，那么在《亮丽家园》中，该空间则是促成了主人公玛丽集矛盾性与混杂性的居间者身份。小说《亮丽家园》中，主人公玛丽刚搬到小镇新区正在开发的“花园宫”，与其他新迁入花园宫的居民相似，玛丽“并没有多少钱，但是希望富有起来”<sup>[19]29</sup>。这些新居所的内部不仅有漂亮的浴室，还有铜制的照明装置，以及与起居室和客厅相配的壁炉。每逢周六，所有男人都在自家房子附近忙忙碌碌，整天都在从事体力劳动，目的只为一两年后，就会有绿色的庭院、石头墙、美观的花床、装饰性的灌木。这里，无论是对现实居所内部装饰的描述，还是对居所外部未来的憧憬，都表现出居住者们对于美国文化的接纳。他们务实、勤劳，相信依靠自己的力量一定能实现自己的梦想。与人情伦理相比，他们更愿意通过法律来解决日常矛盾。因此，当意识到富勒顿太太老旧的房子，尤其是富勒顿太太饲养的鸡影响到自己房屋的美观时，他们不约而同地决定通过合法修路来清除富勒顿太太的房子。小说中，富勒顿太太深受加拿大除英格兰移民之外的其他欧洲移民重农文化的影响，她珍视土地，但是面对美国商业经济文化的冲击，其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却显得脆弱无力。不同的文化，使得富勒顿太太与新居民玛丽成为彼此社会空间中的“他者”。但是，当“花园宫”

的居民一致同意在道路修建申请书上签字时,玛丽拒签的行为又使其成为自身所属社会空间中的“他者”。玛丽的双向“他者”形象正是其作为阈限主体置身于阈限空间的写照:虽不属于任何一种社会空间,但可以容纳不同文化间的矛盾性及混杂性;虽不占据中心位置,却以其包容性和扩张力对“中心”形成挑战及挤压。而这也正是“门罗小镇”所标示的加拿大民族身份。

#### 四、结语

加拿大被殖民的历史注定了其特殊的历史、地理及文化特征,并由此使得加拿大民族身份也处于一个不断被定义的过程中。身处加拿大民族主义盛行时期的门罗,积极通过其后现代叙事方式对加拿大民族身份进行想象。门罗摒弃了传统叙事中将民族身份与宏伟标志性风景及建筑物相联系的写作模式,而是将其熟悉的加拿大日常生活空间作为其对加拿大民族身份进行想象的媒介,通过书写荒野、洞穴、“门罗小镇”等物理空间,门罗在其短篇小说中构建了加拿大民族从殖民拓荒时期、民族主义时期到民族主义消退时期,从疯癫者到自恋者再到集含混、矛盾为特点的“居于间者”的民族身份。

当前,随着科技、经济的全球化,不同民族的身份正悄然发生着变化,本民族与他民族间的界线也日趋模糊。如何在全球一体化的背景下既保有本民族的身份,又能与其他民族共存,门罗文学世界中的“居于间者”不失为一种选择。对于“居于间者”而言,阈限空间赋予其包容差异甚至矛盾的能力,也正是这种能力使其虽不处于中心位置,亦对中心形成挑战与挤压,最终为自己赢得话语权,创造出自己的发声空间。

#### 参考文献:

- [1] 于春洋. 论加拿大民族政治发展的历史演进 [J]. 贵州民族研究, 2011, 32 (2): 19-26.
- [2] FRYE N. The bush garden: essays on the Canadian imagination [M]. Toronto: Anansi, 1971: 220.
- [3]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 想象的共同体: 民族主义的起源与散布 [M]. 吴叻人, 译. 上海: 上海人民出版社, 2003: 38.
- [4] CORSE S M. Nationalism and literature: the politics of culture in Canada and the United States [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7: 12.
- [5] LEFEBVRE H. The production of space [M]. NICHOLSON-SMITH D, trans. Oxford: Blackwell, 1991: 42.
- [6] FOUCAULT M. Of other spaces [J]. MISKOWIEC J, trans. Diacritics, 1986, 16 (1): 22-27.
- [7] 爱德华·W. 苏贾: 后现代地理学: 重申批判社会理论中的空间 [M]. 王文斌,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04: 1.
- [8] 龙迪勇. 论现代小说的空间叙事 [J]. 江西社会科学, 2003 (10): 15-22.
- [9] EDENSOR T. National identity, popular culture and everyday life [M]. Oxford: Berg, 2002: 50.
- [10] 王韵秋. 中心错觉与荒野错位: 盎格鲁-加拿大民族身份建构的内在悖谬溯源 [J]. 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6, 43 (1): 80-85.
- [11] 艾丽丝·门罗. 公开的秘密 [M]. 邢楠, 陈笑黎, 秦侯全, 等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 [12] 袁霞. 艾丽丝·门罗《荒野小站》中的民族国家叙事 [J]. 东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 18 (3): 325-330.
- [13] 戴维·司泰因斯. 隐身洞穴: 加拿大文学的后殖民自恋 [J]. 丁林棚, 译. 国外文学, 2005 (4): 28-36.
- [14] 艾丽丝·门罗. 幸福过了头 [M]. 张小意,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 [15] 曾艳兵. 从“地洞”到“洞喻” [J]. 名作欣赏, 2021 (7): 76-81.
- [16] 徐晓敏. 豪斯曼的悲观主义和坚忍主义 [D]. 上海: 上海师范大学, 2007.
- [17] 琳达·哈切恩. 加拿大后现代主义: 加拿大现代英语小说研究 [M]. 赵伐, 郭昌瑜, 译. 重庆: 重庆出版社, 1994: 197.
- [18] 段义孚. 恋地情结 [M]. 志丞, 刘苏,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155.
- [19] 艾丽丝·门罗. 快乐影子之舞 [M]. 张小意,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3.

[20] BHABHA H K. Nation and narration [M]. London and New York: Routledge, 1990: 312.

[21] 王微. 霍米巴巴阈限空间思想刍议 [J]. 当代外国文学, 2016, 37 (2): 122-130.

## On the National Identity Imagination in Alice Munro's Literary Work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Space Narrative

Zhao Yuxia

**Abstract:** Canada's colonial history determines the long process of the formation of its national identity. From the colonial frontier exploration period, to the British Canada period, and then to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nadian nation-state, Canadian national identity has been constantly imagined and defined. As a carrier of national imagination, literature has always been a tool for writers to imagine and construct their national identity. In Alice Munro's literary world, national identity is usually accompanied by the daily living space of Canadians. Through wilderness writing, caves and "Munro town", she constructed the Canadian national identities of the colonial frontier exploration period in the 18<sup>th</sup> century, the prevalence of nationalism in 1960s and after its receding, finally constructed the Canadian national identity from madness to narcissism and then to "in-between". On the one hand, such narrative style of representing the grand theme of national identity through the writing of common daily living space illustrates Munro's postmodern narrative style; on the other hand, the "in-between" national identity provides different ethnic groups some enlightenment for maintaining its unique ethnic identity and coexisting with other groups in the background of globalization.

**Keywords:** Alice Munro; national identity; space narrative; liminal space

(收稿日期：2022-04-26；责任编辑：陈鸿)